

“小方是谁？” ——兼谈当下新闻研究的一些学风问题

李彬

摘要

本文针对方大曾其人及“小方热”，进行历史性探究与语境化分析，力求辨析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问题，指出对方大曾的宣传属于过度阐述，并非“不当（dāng）”而是“不当（dàng）”。继而反思学风问题，强调新闻研究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标准，特别是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同“事实不正确，一切都不正确”。当下一些研究及其学风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仅背离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而且有违方汉奇、李龙牧、丁渝林等一代新中国新闻史学家开辟的优良学统。

关键词

方大曾、新闻研究、学风

作者简介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电邮：leebin@tsinghua.edu.cn。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振兴基金基础研究专项“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15）”（20175080068）阶段性成果。

Who is Xiao Fang? ——On the Style of Study in Journalism Research

LI B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quiry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about Fang Dazeng and “Xiaofang Fever”, this paper intends to clarify some plausible and ambiguous problems, pointing out that the propaganda for Xiaofang is not "wrong" but "inappropriat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style of journalism research, underlining the importance of some basic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such as the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which means to use the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o analyze problems. Academic

research must be based on facts, and once the facts are incorrect, further arguments that are built on them must be problematic. Some research at the present time take a tree for the forest and violate not only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the good research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journalism historians such as Fang Hanqi, Li Longmu, Ding Ganlin, etc.

Keywords

Fang Dazeng, Journalism Research, Style of Study

Authors

LI Bin is a professor and the director of Academic Committee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Email: leebin@tsinghua.edu.cn.

This paper is a phased objective of the project suppor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Initia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titled with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1815-2015)” (Project No. 20175080068).

一次，新闻学同仁聚谈，不经意间提及时下“小方热”，在座一位著述等身的教授一脸茫然，脱口问道：“小方是谁？”

确实，小方是谁，搁几年前，新闻界恐怕没有几人知晓。然而，随着不知所来何自的虚火不断升腾，有关方面相继卷入或“被卷入”，加上报章杂志连篇宣扬，不旋踵间一个藉藉无闻的小方就声名鹊起，一跃成为百年中国新闻人的旷世奇才，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乃至与范长江比肩，与卡帕 (Robert Capa) 齐名。2017年，《中华读书报》还以大半个版篇幅摘编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即当今“一流记者”学习小方的感悟，声言“中华民族当向25岁的‘小方’行注目礼”（赵拴，2017），一时间仿佛掀起一阵小小的造神热潮。

那么，小方是谁？笔者研习新闻之学已逾四十年，同样孤陋寡闻不清楚，最新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大辞典》（童兵，陈绚，2014）也“查无此人”，不得不设法了解一下，发现基本事实大抵如下：小方，大名方大曾（1912—1937），北京人，出身官宦家庭，摄影爱好者（顺便提一句，当年摄影爱好者犹如今日游艇飞机爱好者而远非大众化兴趣）。1931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1935年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等处工作。1936年赴绥远采访，发表了若干附有摄影作品的通讯，得到范长江推荐，在《大公报》兼任战地特派员。1937年“七七事变”第三天前往卢沟桥，写出报道《卢沟桥抗战记》，配以照片发表，不久失踪，时年25岁。各方“炒来炒去”的关键信息基本如此。小方热吸引眼球的说法——“报道七七事变第一人”，

据初步考证还需存疑。即便认定事实确凿，也与范长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范长江不仅仅是一代名记者（即使如此名记者也成百上千），而且也是所有追求光明、真理以及英特纳雄耐尔理想的中国记者之象征。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象征，“范长江”不仅体现着出类拔萃的新闻禀赋，而且更寄寓着人民记者即“无产阶级记者”的精神内涵，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血脉。

就小方热的关键由头“第一人”而言，实际上也经不起深究。因为，身处时代潮头的记者，记录历史初稿即新闻并影响现实世界乃是天职，正如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无论是谁打响卢沟桥保卫战第一枪，都不会因此成为舍我其谁的英雄，因为没有此人，也有彼人。更何况重大事件突发之际，记者无不争先恐后，又如何分得清第一第二。¹试想谁是报道攻陷巴士底狱第一人？谁又是报道震撼世界的枪声、斐迪南大公遇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第一人？同样，谁能说得清甲午海战、武昌首义、南昌起义、百团大战、新疆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尼克松访华、邓小平访美等报道的第一人？针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人们之所以不知道或不关心“第一人”，是因为重大事件不同于一般社会新闻，往往并非单一问题与简单事件，而是来龙去脉盘根错节，偶然必然环环相扣。故重大新闻的报道并不看谁开第一枪，而看谁击中历史靶心。正因如此，世人不在乎谁先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但不能不在意里德（John Reed）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不关心谁先报道红军长征，但不能不关注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与此相似，记者可以不知道谁先报道“九一八”“一二八”“七七”等事变，但不会不记得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朱启平撰写的《落日》；可以不清楚谁先报道抗美援朝，但不会不熟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黎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新闻界又忆及四十年来诸多经典之作，如报道邓小平南方讲话的《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新闻通讯的作者陈锡添及其幕后故事不用多说了，反正不是“第一人”。

我们熟知的外国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法拉奇（Oriana Fallaci）、卡帕、本多胜一（Honda Katsuichi）、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等，也非“第一人”而传之其名。西蒙·托平（Seymour Topping）的一段亲历记，就足以说明。解放战争期间，他是美联社驻南京记者。解放军横渡长江时，他在南京的大街上，远远听到郊外的炮声、江边的枪声。他打算奔向美联社办公室，突然一辆吉普停在跟前。车上跳下一位军人，有礼貌地问他：

“总统府方向怎么走？”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解放军。”

“解放军已经进城啦？”

“是的，我们已经在凌晨攻占南京城了，为了不惊动老百姓就悄悄进来了。”

托平惊喜不已，解放军占领南京了，现在还没有第二个记者知道这一重大新闻！他马上叫车赶到南京鼓楼大街的邮局。邮局只有一台发报机。此时法新社记者比尔关（Bill Kuan）也跑进邮局。两人都想第一个发报，最后抛硬币决定。比尔关赢了。托平说你快发，发完我发。比尔关说：你放心，我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文字把这条消息发出去。于是，他在电讯稿上只写了两个英文单词“Nanjing falls”，然后兴奋地对托平说：“我的稿子发完了，下面轮你来发了。”托平坐在发报机前，一口气打了两个小时的字，发了三篇稿子。第一篇是快讯《今早共军进入南京，国军已经逃窜》；第二篇是现场特写《解放军进南京城》；最后一篇是综述加新闻背景。第二天，西方报纸刊登的全是托平的稿子，而比尔关的稿子没有一家采用。²（李希光、孙静惟、王晶，2011：205）

总之，以“第一人”为由头的小方热，就像马克思笔下的历史法学派：“它把自己对起源的爱好发展到了极端，以致要求船夫不在江河的干流上航行，而在江河的源头上航行。”（马克思，1842：229）

二

如果是沿着干流上航行，也就是将方大曾及其短暂的新闻活动置于全民抗战的大潮，并与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包括新闻界众多英雄儿女联系起来，那么对其人其事本来不难做出实事求是的叙述：一位抗战初期的业余摄影师或战地记者，采写报道了一些抗战新闻，对鼓舞军民士气产生一定作用，“七七事变”后不久失踪。现在加诸其身日益炫目的光环，显然过甚其辞，既不符合人物本身的历史实情，更不符合并扭曲唯物史观的新闻图景与历史方位，借用列宁（1917：364）的有名论断：

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

连儿戏也不如。

倘若从整体上、从联系中掌握事实，那么，即使不说整部中国新闻史，如范敬宜（2004）为《李庄文集》作序时提及的一批名家：王韬、梁启超、章太炎、邵飘萍、瞿秋白、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胡乔木、恽逸群、邓拓、吴冷西、乔冠华、刘白羽、华山、穆青等，而仅以抗战岁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记者为参照，也不难把握小方的历史定位。且不说徐铸成、萨空了、胡愈之、谢六逸、杜重远、王芸生等数不胜数的爱国报人名记者——他们的历史贡献远在小方之上，也不说1941年抗击日寇的大青山战役中，《大众日报》社郁永言等18位新闻人英勇牺牲，平均年龄20岁〔同时牺牲的还有一位国际记者汉斯·希伯（Hans Shippe），罗荣桓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更不说1942年太行山反扫荡一役中，《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何云等46位中国记者壮烈殉国，史称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仅看上海孤岛时期坚持抗战的报人，就有不少倒在日伪屠刀下，如《大美晚报》的朱惺公³。他编发的《改汪精卫诗》堪称“绝唱”：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因而最终遭到汉奸特务残杀。为此，抗战胜利后，上海报业公会曾经公祭了15位“新闻烈士”，表彰了13位“忠贞报人”。面对如此英雄辈出的风云画卷，神话般的小方热以及如下“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的顶礼膜拜岂非莫名其妙：“面对25岁的小方、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消失在战火中的战地记者，我们只能仰视和跪拜！”

（赵拴，2017）

三

即使就方大曾所属“战地摄影记者”群体而言，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也同样有大批新闻名家，有的“专业”，有的“业余”，从沙飞身上就可略见一斑。沙飞⁴，与方大曾同年出生，抗战期间拍摄了一系列传诵至今的新闻图片，如《战斗在古长城》、白求恩做手术、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以及鲁迅先生平生最后也最有名的照片等。1988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设立中国新闻摄影界最高奖——沙飞奖。2012年沙飞诞辰100年之际，《摄影世界》发表文章，对其一生作了评价：“沙飞是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摄影史的丰碑上。”（蔡毅，2012）事实上，从《良友》画报到《晋察冀画报》，从《人民画报》到《解放军画报》，如此人物与故事俯拾

皆是，在新闻界更是广为人知，如吴印咸、徐肖冰、侯波、石少华⁵、高帆等。袁牧之等拍摄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也提供了许多鲜活真实的新闻记录，如今影视作品时常采用的历史镜头，均出自这些弥足珍贵的影像作品。⁶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新闻或影像作品与社会历史息息相关，用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的话说，“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1849：115）换言之，在新闻发生的当下此刻广为人知，尽到应有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试看一例。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即小方失踪前不久，日寇野蛮轰炸上海火车站，炸死炸伤无辜难民近千人。摄影师王小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拍下了那张家喻户晓的照片：一位孤苦伶仃的幼童坐在铁轨边嚎啕大哭，撕心裂肺。照片在有名的《生活》（Life）画报刊出后，天下哗然，举世谴责。面对国际舆论，恼羞成怒的侵略军宣称照片是伪造的，悬赏缉拿王小亭，王小亭被迫逃亡香港。与此相对，现在发掘的许多小方图片，当年并没有传播，自然也无声无息，与社会历史相隔绝，如今作为文献可备一格，但与新闻了不相干了。假定一支汉朝军队远击匈奴，不幸迷失在沙漠之中，从此失联，如今考古学家发现他们的遗骸，于是我们可以说历史上有过这样一支队伍，也可以说他们赍志以殁，壮志未酬，但总不能说这支队伍如何追亡逐北，如何勇冠三军。

当然，宣扬小方并非“不当（dāng）”而是“不当（dàng）”，小方热的立意或许在于矫正当下“新闻”乱象，弘扬“新闻理想”，彰显“专业精神”。倘若如此，那么，是什么就说什么，如实说说“报道七七事变第一人”也未尝不可，但不能任性拔高，过度阐述，更不能有意无意忽略丰富多彩的历史运动及其新闻图景，包括其中无数默默无闻为人民的中国记者，如成千上万做出历史贡献的业余记者通讯员（方大曾只是其中普通一员）。对此，即使不讲共产党共和国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如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不论新闻记者的基本要求如“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至少也应遵循从马克思到习近平都强调的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相对于根据希望来描述事实），这既是一条新闻铁律，也是知人论世的学术底线。

四

虽说严肃学界不会在意“小方热”，不知“小方是谁”也无关宏旨，但其中折射的一些学风问题却不无普遍性，故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不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之。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所谓指导地位，首先在于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认识层面的实事求是与价值层面的人民主体，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灵魂。如果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希望把握事实，如果不是“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而是忽略事实发生的历史脉络与社会语境，脱离事物之间普遍的、有机的、变动的内在联系，乃至于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类现象从专家著述到博士论文同样时有所见⁷，那么，不仅有悖实事求是原则，而且也有违求学问道的基本准则，更不用说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了。钱乘旦（2018）针对时下学风的批评，也值得新闻研究深思：

事实是检验学术的基本标准、也是最主要的标准。学术当然有诸多标准，比如规范与否、文字好坏、逻辑如何、论证怎样，等等；但这些只属于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符合第一层次的基本标准。现在学术界有一个通病，就是脱离事实，凭空想象，从推理到推理，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殊不知，逻辑的正确不意味着事实的正确，一旦事实不正确，一切都不正确。

虽然事实正确不见得其他就一定正确，但事实不正确，一切肯定不正确，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与立脚点。以方汉奇、李龙牧、丁淦林等为标志的一代新中国新闻史学家，开辟了既不同于民国、也不同于外国的全新学统，并获得学界普遍关注，包括国际学界，而其精髓正在于实事求是。⁸如今，“守正出新”颇受青睐，而守正之“正”也在于实事求是，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毕竟人世间一切学问、知识、理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社会历史实践，也就是实事求是之“事”。离开实事求是的底线，则无论多么新潮的理论，如何前卫的观点，怎样炫目的新说，都难免游说无根，最终也如南宋吴文英的词作——“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另外，小方热生硬比附西方记者罗伯特·卡帕也值得推敲。一方面，卡帕一生亲历并报道了从二战到冷战的各个重大战事，如西班牙内战、武汉保卫战、诺曼底登陆、越战，他的新闻人生引人注目也不在于所谓“第一”，而在于介入历史、影响世界的一系列力作，他的名言更令人过目难忘：“你拍得不够好，是由于你离前线不够近。”另一方面，中国记者“扬名立万”为什么非得比附欧美记者呢，

其间心态是不是也透露着萨义德（Edward Said）剖析的“东方的东方学”（萨义德，1997/2007），以及刘禾等揭示和批判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呢？（刘禾，2016）从邵飘萍到瞿秋白，从范长江到邹韬奋，从邓拓到穆青，一代又一代中国记者在追求自由、解放、独立、富强的伟大斗争中，在向往英特纳雄耐尔的大同信仰中，不是含有一种更高远、更神圣的新闻理想吗？范敬宜的名言“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不比卡帕的名言高出一筹，至少各领风骚吧。如果中国记者的专业地位都得西方记者背书，又如何体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呢。⁹

回到开篇问题——小方是谁？一句话，小方即方大曾是一代代中国记者的一员。他的故事可以作为一段逸闻激励鼓舞后人，但不能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更不能想当然勾画一个隔绝于千千万万新闻人，包括新闻摄影人及其历史作为的孤胆英雄和历史神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抗战新闻史也不是一人谱写的。因此，小方热可以休矣，神话终究是神话，而非事实，更非真理，周恩来的名言同样适用于此：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责任编辑：束开荣）

注释 [Notes]

1.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乌拉圭左翼记者加莱亚诺，少年时代在课堂上听到西班牙殖民者巴尔博亚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第一人，便忍不住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参见加莱亚诺（2009/2012：1）。
2. 托平后任《纽约时报》主编、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与荣誉教授，并任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主席达二十年。李希光教授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任上时，曾经聘请托平教授担任新闻学院首届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并陪他重返淮海战役战场。
3. 朱惺公（1900-1939）：中国报人，原名松华，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家境清寒，早年辍学，后自学写作。曾撰长篇小说在《浙江潮》上连载。1928年任《浙江商报》副刊编辑。30年代初在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广告课任职，并一度兼任《时代日报》编辑。1938年2月任《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编辑，以此为阵地，在孤岛上海宣传抗日救亡。11月在《夜光》上刊出四期《菊花专辑》，号召国人效仿菊花与西风战、严霜战；并刊载《改汪精卫诗》，讽刺汪伪政权汪精卫。1939年8月30日被日伪特务杀害。参见童兵、陈绚（2014：979）。
4. 沙飞（1912-1950）：中国新闻摄影记者，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1935年6月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在《生活星期刊》《作家》《光明》《良友》《时代》《中华图画》《中流》等报刊发表鲁迅照片和反映工农大众困苦生活的照片。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

华北前线，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采访平型关大捷，成为人民军队第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后任《抗敌报》副主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1939年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1940-1946年共办了八期摄影训练队，颇有影响……”参见童兵、陈绚（2014：993）。

5. 为纪念石少华诞辰100周年，2018年9月30日《光明日报》刊发记者于园媛的报道《从硝云弹雨中走来》，其中写道：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60载，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长期主持新闻摄影工作，后来又成为全国摄影界的主要负责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石少华以相机为武器，投身枪林弹雨。他拍摄的《肃清强敌》《埋地雷》《八路军骑兵部队》《步涉于渤海海滨的洼地》等前线场面，在影像资源极其稀缺的年代，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地道战是冀中平原人民进行游击战的典型代表。地道空间狭窄，光线黑暗，而拍摄设备又极其简陋，石少华经过多种尝试，才拍出在构图、光线、场景上皆令人满意的作品。《地道洞口在哪里》《年画后面就是地道洞口出入口》《在地道交叉口的游击队员》《在地下卫生所给伤员换药》等作品，主题突出，充分反映出冀中人民出奇制胜的才智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参见于园媛（2018）。
6. 传播学出身的青年学者高初——“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近年来在中国摄影史方面颇有研究，出版了《最前线：中国共产党抗战图像志》等成果，举办了一些颇受关注的摄影展，如201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光影人生：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2015年的《中国摄影：二十世纪以来》摄影展上，开列了一批中国摄影人名录：老焱若，郭学群，汪孟舒，郑颖荪，吴郁周，舒新城，陈万里，骆伯年，郎静山，庄学本，吴中行，方大曾，金石声，刘半农，林泽苍，石少华，吴印咸，张印泉，郑景康，蔡俊三，梁祖德，黄翔，薛子江，蓝志贵，高帆，牛畏予，徐肖冰，侯波，袁毅平，陈复礼，张其军，刘旭沧，吴寅伯，姚经才，简庆福，曾湘敏，陈宝生，石志民，任曙林，王志平，李晓斌，彭祥杰，王耀东，陈勇鹏，肖全，石宝琇，于晓洋，吕楠，解海龙，吴家林，侯登科，刘香成，姜健，邢丹文，曾璜，安哥，于德水，王文澜……2018年国庆前，上海《文汇报·文汇学人》以近五个版的篇幅介绍高初的研究成果，参见李佳怿（2018）。
7. 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年，一些著述依然延续“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的思路（主要是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对新中国新闻业缺乏深入、系统、全面、细致的研究，更缺乏同情之理解，自觉不自觉延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陈词旧调，率性臧否，随意评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形而上学之嫌。有学者甚至将前三十年的新闻教育与台湾作比，认为前者一无是处而后者长足发展，无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为新中国新闻界培养造就了大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其中许多人也成为改革开放年代新闻界与新闻学的骨干与中坚，而同

时期台湾却是白色恐怖，报禁严苛，血雨腥风，独裁暴虐，不仅共产主义者遭到疯狂摧残，而且殷海光、雷震、李敖等自由主义者也同样饱受迫害。

8. 关于新中国新闻史学的缘起，方汉奇曾与王天根教授谈过如下背景：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工作的重点，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史，比较大的成果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轮廓给勾画出来了，留了一套中央党校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这部讲义是50年代初期中央党校编写的，着重介绍和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建国以前的近30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历史。1959年，这部讲义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内部教材铅印出版。当时出版的讲义并未署名，实际上是中央党校新闻班的“四大金刚”——李龙牧、丁树奇、黄河、刘爱芝共同编写的。……后来李龙牧、丁树奇去了复旦大学任教，黄河、刘爱芝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们分别又编写了各自学校所需要的教材，这就是：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总的来说，这几部讲义和教材是新中国前3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弥补了旧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空白，奠定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史学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这几部讲义和教材确实属于建设性的工作。你看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他基本上不谈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向导》《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都提到，但主要是用一些基本的数据，大概一两行、两三行就完了，几十个字、百把字就完了。那是因为戈公振的书是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写成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基本上就不能提了，当然他的书重点也不在后头。参见方汉奇、王天根（2015）。
9. 小方热回避或忽略“三大飞跃”中无数声名卓著、功不可没的新闻人，仅仅比附早年范长江，即尚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名记者，甚至比附西方记者卡帕，是否也折射着时下思想文化领域“去政治化”或“去政治化政治”的潮流，如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另外，小方热是否也与民国热遥相呼应？兹事体大，本文力有不逮，提出疑问，有待方家深究。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爱德华·萨义德（1997/2007）。《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
-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2009/2012）。《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张伟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蔡毅（2012）。化作飞沙当空舞——写在沙飞百年诞辰，《摄影世界》，（5）。
- 范敬宜（2005年4月8日）。新闻典范在咫尺——《李庄文集》序。《人民日报》，15。
- 方汉奇，王天根（2015）。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方汉奇先生治学答问。《安徽大学学报》，（2），98-104。
- 李佳怿（2018年9月28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研究所主任高初：中国战时摄

- 影，“燃起一股热力”。《文汇报·文汇学人》，B2-6。
- 李希光，孙静惟，王晶（2011）。新闻采访写作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列宁（1917）。统计学和社会学。载中央编译局（编译）（1990），《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3-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刘禾（主编）（2016）。《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三联书店。
- 马克思（1842）。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载中央编译局（编译）（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二版）（第229-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1849）。《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载中央编译局（编译）（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二版）（第115-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 钱乘旦（2018年4月16日）。学术研究须根植于事实。《光明日报》，14。
- 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1。
- 童兵，陈绚（主编）（2014）。《新闻传播学大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于园媛（2018年9月20日）。从硝云弹雨中走来。《光明日报》，11。
- 于宁（主编）（2016）。《新闻经典（摄影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赵拴（2017年6月21日）。中华民族当向25岁的“小方”行注目礼。《中华读书报》，12。